

如同《马可·波罗行纪》在欧洲吸引诸多航海家踏上前往东方的神秘旅程,《撒马尔罕的金桃》在近几十年中激发了无数西方人对于唐朝社会和文化的兴趣。该书的作者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没有来过中国,但他却凭借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及奇幻优美的文笔,一度成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汉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为中华文化向西方传播搭建起一道宽阔的桥梁。

从象牙塔迈向疆场

1913年8月23日,薛爱华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后随家人迁至加拿大温哥华。高中毕业后,薛爱华跟父母返回美国,定居旧金山,准备进入大学学习。1929—1933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家庭经济情况恶化,薛爱华不得不中断学业,依靠打工贴补家用。生活的颠簸并没有消磨薛爱华对知识的渴望之情,在两个国家生活的经历锻炼了他学习外语的能力,工作之余,薛爱华常前往藏书资源丰富的洛杉矶公立图书馆阅读各种书籍,并通过馆藏英译汉籍初次接触到中国文学。

1934年,薛爱华考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修读哲学、物理学。在学习过程中,他对人类学的兴趣与日俱增,并在本科最后一年转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和罗伯特·罗维。不仅如此,在伯克利,薛爱华还结识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导师——俄裔美籍学者卜弼德。大学毕业后,薛爱华赴夏威夷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恰逢赵元任、陈受颐等著名学者任教于此。经由他们的指导,薛爱华在中国语言、历史、文学等方面的学习能力突飞猛进,他以研究唐代中西交通为突破口,完成了《唐代中国的波斯商人》硕士论文。1940年硕士毕业后,薛爱华进入美国汉学研究重镇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费正清等人的影响下,社会科学以及近现代中国研究颇受追捧,这对此前一直主攻欧陆传统汉学与语文文献学的薛爱华而言,属于一项全新的挑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薛爱华在哈佛大学的深造被迫中断,随即应召入伍,服役于美国海军情报部门,负责破译日军电码。战争期间,薛爱华的表现十分出色,屡立战功,不仅获得一枚勋章,还晋升为海军上尉。这段经历锻炼了薛爱华的日语能力,同时给他充足的时间思考自身学术取向与未来发展。

战争结束后,薛爱华从疆场回到象牙塔。他没有返回哈佛大学,而是选择前往以传统汉学研究见长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



美国汉学家薛爱华： 中国古典意象的呈现与超越

□ 蒋爱花 张君毅

博,成为东方语言与文学系教授卜弼德门下的弟子。卜弼德广博扎实的治学风格以及深厚的考据学功底对薛爱华产生了关键影响。1948年薛爱华博士毕业,同年留校担任东方语言与文学系讲师,由此开启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汉学研究之路。

在伯克利的治学生涯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的数十年间,薛爱华一方面坚守传统,另一方面不忘推陈出新。阅读薛爱华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汉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从治学方法上看,薛爱华立足于欧陆汉学传统,同时注意吸收近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成果。他工作的年代,正处于二战后美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阶段。凭借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美国在国际汉学研究领域的地位迅速上升,逐步达到了与欧洲、日本相提并论的程度。高速进步带来了强烈分化,出于现实需要,美国社会更加关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等问题,强调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法律学等社会科学理论,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相比之下,侧重对古代文献进行翻译、注释和考证的传统汉学研究似乎有些“过时”。著名学者列文森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过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矛头直指传统汉学研究。在他看来,必须将中国放置于普遍性的世界话语体系与西方进行对比研究。面对新式中国学的挑战,薛爱华的态度是包容且开放的,他志不在分出新旧高下。按照薛爱华的观点,“古典汉

学家”“现代主义者”等提法存在范围性问题,参与争论的学者分属于各学科,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标本身存在层次差异;只有根据不同标准,在具体研究中评价得失才有学术意义。薛爱华自认为是一位“语文学家”,所谓“语文学”,即是指通过对人类语言以及文本文献的研究,最大程度还原出古代世界历史和文化的真实面貌。薛爱华的研究立足语文学但不拘泥于此,先前所学的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知识也被他充分吸收。1954年,薛爱华的第一部专著《阆国》出版。这本书颠覆了传统史学作品的体例,采取一种类似人类学中“文化区域”概念的研究范式,对阆国社会与自然进行了全方位考察,揭示出在北方五代乱世里,中国文化在较为安定的南方王朝发展变化的轨迹。除传世史料外,大量中西方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成果也被薛爱华采用,对文献的细致解读以及对社会科学理论的综合运用,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多种资料与研究方法相融合的特点。

从研究领域而言,薛爱华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和中西交通方面。受自身文化视角影响,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历史时,常会对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民族、政权的交往情况多加留意。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之一,唐朝国力强盛,对外交往频繁,许多汉学家都将唐代及其前后的历史阶段作为研究重点,薛爱华也是如此。不过有别于大多数学者站在唐朝的角度叙述国家对外交流情况,薛爱华则把目光对准不易引发关注的边缘地带,他的作品《朱雀》《珠崖》便探讨了唐代中国的南部边疆,展现了

汉族与周边异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说,薛爱华早已具备当下流行于史学界的“从周边看中国”的意识。现今“物质文化”一词大体相当于中国古代史学家所言的“名物”。国人对于名物的兴趣由来已久,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初期的《山海经》便是一部记录了上古时期各种名物的百科全书。当薛爱华研究某个时代、地区的社会文化时,名物往往被他当成切入点,《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中就用西域康国向唐朝进贡的“金桃”象征唐代舶来品和外来文明。该书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唐代的居民、动植物、食品、药品、纺织品、矿石、书籍等,内容扎实细致,涉及唐朝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堪称是唐代社会文化史与中华文明对外交流史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史学家可以通过对历史现象和意义的抽象描述来概括唐朝的强大与繁荣,但这些现象和意义对读者而言无疑有距离感,是陌生的。当读者打开《撒马尔罕的金桃》,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躺在货箱里跟随商人一步步走完前往唐朝的旅程,体会到唐人饮酒品茶、把玩宝石玉器时的感受,生活的情感由此被唤醒,唐朝盛世随之以一种真实可感的状态呈现在大家面前。

在文本书写方面,薛爱华富有文采的表达方式极具吸引力。从《撒马尔罕的金桃》开始,薛爱华一直选用意象优美、富有神秘感的词汇命名自己的专著。这些书名既与研究主题相关,又富有联想性,充分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撒马尔罕的金桃》的中文译者吴玉贵最初将本书标题译为《唐代的外来文明》,是因为当时国内读者对此书了解不

多,而书名又非常生动,“不改名的话,读者走进书店看见《撒马尔罕的金桃》,会误以为是小说”。薛爱华的文笔以简洁典雅著称,他在翻译中文资料时不但力求准确,还主张尽可能地呈现出原文的风格与意味。对文学情有独钟的薛爱华擅长在论著里引用西欧诗歌、小说中的语句形容研究对象,莎士比亚、福楼拜、普鲁斯特等文豪的作品都曾被他用。

学术与社会活动

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里,薛爱华像自己的导师卜弼德那样,在课堂上潜心育人,一方面重视向学生传授西方汉学研究的基础知识,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学生寻找新材料和新研究领域,鼓励他们用新方法 with 视角分析已知问题。在薛爱华不遗余力的培养下,他的学生孔丽维、柯素芝等都凭借出色的学养在当代美国汉学界中占据一席之地。

教育不止步于课堂,薛爱华的身影还活跃在各种学术与社会活动中。他参加的学术组织不计其数,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成立于1841年的美国东方学会。该学会历史悠久,会员众多,学术声誉极高,薛爱华大部分论文发表在该学会创办的《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上。1951年,薛爱华同卜弼德一起,创立了美国东方学会西部分会,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汉学研究的交流与发展。

闲暇之时,薛爱华会在一些通俗刊物上发表文章,参加公众讲座与电视节目,演讲主题全方位涵盖了中国古代历史、艺术、自然科学等领域,以此向社会大众普及中国文化。由于政治以及文化上的隔阂,20世纪下半叶不少美国人对中国抱有偏见。薛爱华通过努力,帮助许多美国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华文明,从而为中美友好往来营造了良好氛围。

1991年2月9日,薛爱华因病去世,享年78岁。令人惋惜的是,对中华文化研究如此之深的薛爱华,终其一生未踏足中国土地。尽管如此,薛爱华对中古中国文化的研究仍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他关于唐代物质文化的研究成果将伴随光辉灿烂的唐代文明一同流淌在历史长河中,引发后人的赞叹与追寻。



古希腊罗马是如何认识印度洋的

□ 李大伟

历史上印度洋对于西方人有着特殊意义,代表着东方的财富以及西方对东方的认知,到达印度寻找财富成为西方人的夙愿,一直持续到近代新航路时期。由于天然的地理阻隔,古希腊罗马社会对印度洋的认识远不及印度洋周边族群,其关于印度洋知识的获取主要有两种方式,即现实的亲历与间接的想象。

(一)

古希腊人在印度洋的航行较为稀少,相传波斯国王大流士麾下一位希腊将领斯科拉克斯曾率海军入侵印度河,但直到亚历山大征服东方时,希腊人才更多涉足与东方的交往。亚历山大东征时,希腊将领尼亚库斯曾率领舰队从印度航行到波斯湾;亚历山大亦曾派遣队伍从波斯湾与红海探寻海路。亚历山大逝世后,塞琉古与托勒密王朝分别占领波斯湾与红海地区,公元前2世纪中叶波斯人占领两河流域的塞琉西亚,让希腊人难以通过波斯湾与印度保持交往;希腊人则主要在托勒密王朝通过对红海与亚丁湾等前哨地区的征服,涉足印度洋事务。此时也出现了一些与印度洋航行有关的希腊人士,如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二世舰队司令与地理学家提摩太尼,公元前2世纪的阿基波斯以及第欧根尼、西奥菲洛斯特等,其中第欧根尼与西奥菲洛斯特对印度洋的了解来自于个人亲历。

公元前30年罗马人占领埃及,通过继承托勒密王朝在红海的遗产扩大在印度洋的影响,尤其是与帕提亚帝国的矛盾促使罗马人在印度洋探索,因为所有到达罗马的东方物资都须向帕提亚及阿拉伯半岛的王国支付大量通行费,除非罗马开拓一条通向印度的海路。罗马在红海地区不断扩张,通过与阿比尼西亚结盟,势力渗透到阿拉伯半岛与非洲沿线。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曾记载,在托勒密王朝末每年不到20艘船只敢穿越阿拉伯海红海到曼德海峡以远海域,但奥古斯都时期每年至少有120艘船从曼德海峡到达印度。同时,罗马人试图通过占领波斯湾打通通向印度的航路。罗马将领克拉苏、安东尼等曾多次入侵帕提亚,企图占领波斯湾,但皆以失败告终。2世纪初哈德良皇帝时,罗马帝国的势力深入到波斯湾头;162—168年,罗马皇帝安东尼发动对萨珊波斯的战争,再次占领波斯湾头,一度打通了海上通往东方的道路,甚至派遣使节到达汉朝。《后汉书·西域

传》记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梁书·诸夷传》亦记载大秦(罗马)商人秦论到达吴国。

比较而言,由于帕提亚与萨珊波斯的强大实力与地理之便,导致罗马人对波斯湾的控制较为薄弱,呈现出间歇性状态,远没有通过埃及红海地区到达印度洋那样稳定持久。古希腊罗马人主要是通过埃及红海地区进入印度洋,这些活动为其认识并获取印度洋知识提供了条件。

(二)

古希腊罗马人在埃及红海与波斯湾的经略,自然让更多的希腊罗马人航行在印度洋,但是被史料明确记载亲历印度洋航行的希腊罗马人士并不多见。斯科拉克斯、尼亚库斯、第欧根尼与西奥菲洛斯特等应是为数不多被记载的希腊人士。之后,一位名为希帕鲁斯的希腊航海者,观察到了印度洋规律的季风,并航行到印度,印度洋季风因此被称为“希帕鲁斯”;再有大秦王安敦向汉朝所派使节与罗马商人秦论等。

此种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希腊罗马人在印度洋的活动。托勒密王朝与罗马人尽管一度打通了印度洋航道,但其在印度洋的活动主要凭借当地航海人士,尤其是托勒密王朝。迄今尚未有证据表明在2世纪图拉真运河开通之后地中海船只通过苏伊士地峡进入红海。即使是在运河开通后,从地中海到达红海的船只也极为稀少。罗马帝国大部分时期,印度洋航行与贸易应掌握在来自埃及的人(希腊人、埃及人或其他族群)、阿拉伯人与印度人手中。因此,可以想象在图拉真之前,任何一位航行到印度洋的希腊罗马人更有可能搭乘的是在埃及建造的船只。

因此,对比阿拉伯人与印度人等而言,亲历印度洋航行的古希腊罗马人应非多数。这种状况在古希腊罗马社会关于印度洋知识结构中体现得比较明显,表现为古希腊罗马地理学家流传下来的直接关于印度洋知识记载的严重匮乏。的确,无论有多少古希腊罗马人曾在印度洋航行,但其关于印度洋的记载却鲜有保留下来。相传斯科拉克斯曾撰写过从印度河口到红海的航行记,但并未流传下来。希腊将领尼亚库斯曾著《印度》记载从印度航行到波斯湾的行程,遗憾的是已经佚失,罗马地理学家阿里安《印度》与斯特

拉波《地理志》中对其有所提及。托勒密王朝在红海地区探测时曾写下了一批航行记,但仅有少许残篇存留。2世纪上半叶,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罗马人远航印度洋,将其见闻写成报告带回罗马,但此报告亦未存留下来;2世纪中叶希腊地理学家马林努斯曾据此对印度洋地区有所记载,其著作亦未能保存下来。

在众多遗憾中,值得庆幸的是1世纪中叶一位来自埃及的匿名希腊人,作为罗马人的臣民远航印度洋到达印度贸易,并记载了由西方组织的与东方的海上贸易,即《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以下简称《周航记》)。此《周航记》被幸运地保留了下来,现存10世纪海德堡大学与14—15世纪大英博物馆藏两件手抄本。在现存古希腊罗马地理学家关于印度洋的记载中,《周航记》作者通过亲历者的视角对印度洋地区进行了最完整与最权威的记载,是古希腊罗马地理学家关于印度洋直接知识记载存留的稀世珍品。

(三)

比较而言,其他古希腊罗马地理学家关于印度洋的知识大多源自“间接的想象”,即二手信息,其自身对这些地区并无任何亲历与感受。在古代希腊作家中,希罗多德曾记载绕非洲的航行,此航行是由腓尼基水手完成,而非希腊人。有“现代地理学之父”之称的古希腊著名地理学家厄拉多塞曾著三卷本《地理志》对印度洋地理状况有所记载,主要凭借的是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所藏地理著述;该书原著已佚失,其部分残篇保留在普林尼与斯特拉波的著述中。公元前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阿伽萨勒奇德斯曾著述五卷本《厄立特里亚海》,其资料来源主要为政府文献,原著已佚失,仅存9世纪君士坦丁堡牧首佛提乌节选内容,普林尼与斯特拉波等对其内容有所引用。古希腊地理学家提尔的马里斯努斯,生前著述大量地理作品,对印度洋有所记载,但亦并非来自个人亲历,且这些作品已经佚失;托勒密《地理志》对马里斯努斯的地理著述进行了大量参考,构成了其主要的资料来源。

在古希腊罗马地理学家中,对印度洋记载尤详的作家以斯特拉波、普林尼与托勒密为代表。斯特拉波曾著十七卷本《地理学》,系统描述了直到罗马帝国时代的古代世界,其中大量涉及印度洋沿线国家与地区。作为一名

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热衷游历,但其足迹主要集中在罗马帝国,有可能参加了公元前24年罗马对阿拉伯地区的远征。斯特拉波《地理学》也主要以间接资料为主,其曾在亚历山大里亚收集各类地理资料,广泛采用了古希腊地理学资料,尤其是涉及罗马帝国之外的地区。普林尼在《自然史》写作过程中亦广泛凭借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各类著述,其关于印度洋的记载与《周航记》非常类似;《周航记》甚至被认为是普林尼关于印度洋知识的直接来源。托勒密常年居住在亚历山大里亚,其所著《地理志》对希腊罗马人的地理知识进行了全面讨论,主要参考了提尔的马里斯努斯的地理著作,尤其关于非洲东部海岸等印度洋地区的记载。3世纪希腊地理学家阿伽塞美鲁所著《地理简图》亦多参考托勒密及其他早期地理学家作品,其关于印度洋的记载也是源自二手信息。

因此,在古希腊罗马地理学家现存关于印度洋的记载中,主要源自于对历史上相关印度洋著述与文献的综合与继承,从知识形成过程表现为对印度洋知识的不断汇总与叠加,鲜少来自个人亲历与直接获取,呈现出“间接的想象”认知特征。承袭前人成果的书斋学者成为主流,前辈先贤的著述与官方文献被视为权威资料来源,并以此塑造了古希腊罗马社会关于印度洋的知识结构。当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古希腊罗马地理学家关于印度洋的知识存在多少讹误,但却显示缺乏对印度洋知识的直接获取,知识更新自然比较滞后。

古希腊罗马地理学家关于印度洋的知识代表着西方社会对印度洋的原初认识,其知识来源体现了西方社会关于印度洋知识结构的形成过程。此种状态亦符合传统以来西方对东方及其他未知世界的认知。由于地理阻隔,古代东西方缺少直接交流,西方视野中的东方多依赖二手信息,自然存在一些“间接的想象”成分,反之亦是如此。此种认识差异的消弭有赖于双方交流与直接知识获取的增多,唯有此才能将更多的想象变为真实的认知。

